

教育的困境與 改革的困境

作者◎王震武、林文瑛

桂冠叢刊④3

教育的困境與改革的困境

王震武、林文瑛 合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教育的困境與改革的困境 / 王震武, 林文瑛
合著。--初版。--臺北市：桂冠，1994[民83]
面； 公分。--（桂冠叢刊；43）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551-812-8 (平裝)

1. 教育—論文, 講詞等

520.7

83010455

序 言

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歸結那千絲萬縷的人間情緣時，描寫出家得道的甄士隱和一身俗骨的賈雨村在「急流津覺迷渡口」相遇，一陣攀談之後，

「士隱便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

甄士隱所謂的「兒女私情」指的是他和香菱的父女情。兒女之情足以繫住世外高人，天下人的兒女自然會繫住像我們這種慧根不足的人。

經濟快速成長中的臺灣，是個「名利無雙地」，這裡有的是名利爭逐與恩怨情仇，人生百年，紅塵萬丈，急流之不能湧退，半生執迷不悟的，正是那為教育愁腸百轉的心境。「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富裕的臺灣卻正透過教育有系統地扼殺才氣，踐踏嬌兒。

半世紀以來，我們的教育所做的只是人力資源的篩選、加工與淘汰，這個長期經驗使整個社會普遍相信，高中和大

學是尊貴的，只有極少數的人才夠格去唸；使許多老師相信，放下打人的棍子就同時放下了教育的責任；使家長們覺得分數比人還重要，參考書比教科書更好。大部分人不明白，分數是用來警惕老師的，不是用來判定學生的一生命運的；連某些教育系的教授都以為，教育水準的維持靠的是升學瓶頸一關關的淘汰。

教育的現實是什麼？「江山猶是昔人非」，一個個美麗的校園，流行的卻是「積非成是」的觀點。這些觀點不但主宰著教育，也主宰著官方的所謂「教育改革方案」。數年來，我們發起、推動、參與教育改革的工作，幾近無役不與，然而，真正把我們推上火線的卻是號稱「四十年來最重要的教育改革方案」的自學方案。

用一套升學分發技術套在所有國中生身上，使國中教育變成三年的淘汰賽，這就是自學方案的所謂教育改革。用這套辦法去解決校長們違規能力分班、教師們違規補習、不按課表上課的問題。數十年來，不爭的事實是，聯考不知消磨了多少年輕人的雄心壯志，於是自學方案就輕易地拿聯考做為一切教育問題的代罪羔羊。

我們曾為自學方案寫過數不清的文章，參加了不計其數的辯論，也做過不少相關的研究。今天，局勢已經十分明白，自學方案終將隨政海波濤起伏與俱去。這個一度風光的方案，這場粗魯草率的「教育改革」，立刻就要沉埋在各級官署的檔案裡。然而，我們這些民間的教育改革工作者，卻都受到它的洗禮，使我們對於教育問題的根源有了深刻的體悟。由於自學方案，我們決心弄明白那藏在背後的反教育因子。

這本書是自學方案開始退潮的時候，我們為臺灣教育所作的診斷。許多流行的觀點被我們拿來重新檢視，許多現象被我們重做學理分析。上帝造人，留一些未完成的工作給教育，然而，辦教育的人畢竟不是上帝，因此，教育上的爭議極多。我們努力要做的只是在不爭的地方，還它一個明白。

我們有幸，來到人間，跟人世的兒女有了無法割捨的情緣，人世的兒女不幸，生在臺灣，必須苦等那教育改革的訊息。希望這本書多少是個訊息，透露一點教育改革的義理。果能如此，我們都應該感謝桂冠圖書公司的賴阿勝先生，感謝他為了臺灣的教育，不計盈虧，慨然應允出版這麼一本非關風月、無益閒情的書，也要感謝桂冠公司的黃彩惠小姐，沒有她的盡心安排、高效率的工作，這本書不會這麼順利的與讀者見面。桂冠編輯部的石曉蓉小姐實際負責這本書的編校工作，她的細心和井然有序的做事風格都是十分少見的，自然應給予最誠摯的謝意。

王震武 林文瑛

一九九四年八月

目 錄

序 言	i
引論：教育的體質與環境.....	1
教育的正義	13
升學主義、升學制度與升學症候羣	39
打罵教育探源	77
教育改革的制度面——它的運作與反運作機制	131
自學方案的意識形態分析.....	169
附錄一 家訓資料分析書目一覽表	209
附錄二 〈打罵教育探源〉問卷	217
附錄三 〈打罵教育探源〉受訪者在 開放式問題中的反應分類	223
參考文獻	247

引論：教育的體質與環境

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在備嘗亡國之痛後，著文論列「學校」，開宗明義主張教育的目的在：

蓋使朝廷之上，間間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
(《明夷待訪錄·學校篇》)

事隔三百年，人類的思想、知識，以及社會、經濟狀況，已迥非昔年面目，然此時此地若能重起黃宗羲於地下，與之細論當前教育，恐怕前引一段話猶足以鍼砭當世。

如果用今天的用語把黃氏的話重說一遍，則教育的目的在人格的薰陶（使人人有「詩書寬大之氣」），在培養獨立思考、不與時浮沉之士（是以「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不是洗腦或思想控制的工具（「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學校可以應社會及個人的需要提供某種職業教育（「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然而卻不僅是職業訓練，乃至於培養廉價勞力的地

方（「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

從教育哲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觀點可以說是古今不易、中外皆然的。今天談教育，必須從這個教育的根本目標談起，才不會迷於表象，惑於紛雜，才有望起一點正本清源的作用。「臺灣的教育需要改革」，這是近年來官方與民間難得的共識，為了達成這個共識，整個社會已經整整虛耗了半個世紀，犧牲了好幾代人的發展機會，付出了慘痛的社會成本。不幸，共識卻僅止於此，至於怎樣改革，官方與民間，學者與學者之間，乃至於民間改革團體之間，都有些不太一樣的觀點。其中，官方與民間改革團體的歧異尤為顯然，簡直可以說，「內閣以為是者，外間必以為非」，「外間以為非者，內閣必以為是」。官方所提出來的改革方案常遭民間的激烈反對，對於民間所提出來的各種改革要求，官方則多方設詞推托，或乾脆加以拒絕。

觀點的分歧反映的其實是，對當前教育問題的診斷不同。以官方推出的所謂「四十年來最重要的教育改革方案」——自學方案——為例，這個方案想要改革的是「不按課表上課」、「違規能力分班」等學校不正常現象，問題在教育，訂出的改革辦法卻是個升學分發辦法，學校有了問題，卻要用學生的成績考查辦法去糾正。這些都使人懷疑當初官方的教育診斷是怎麼做的。官方以為只要取消聯考，代之以新的升學分發辦法，就解決了大部分的問題，然而聯考既然集社會的三千怨恨於一身，為什麼能歷數十年而屹立不搖？這個問題恐怕官方真的沒有仔細想過。民間的看法就與此南轔北轍，今年春天的四一〇大遊行以「廣設高中大學」為主要訴求，正表示民間認為問題出在「升學機會」太少，而不

在「升學分發制度」是什麼。

學校與社會

今天各方的共識在於，大家都看到了教育的不正常。這些不正常表現在許多方面：教育成果低落、教育的體質異常、學校的運作違反常理。即使是最不關心教育的人也可以看出今天中小學的教育成果令人失望：經過教育，孩子們的身心健康普遍變壞了，學校裡的自殺案件多到怵目驚心的地步，青少年犯罪率大幅提升，校園充斥著暴戾之氣，毒品流行，離妓大增。

教育的體質異常則是有識者所常痛論的。譬如說，教材的僵化、教條化、黨化、落伍、錯誤；國中小的學校規模與班級規模太大，使人性化的教育近乎不可能；師資培育的僵化與一元化，教師進修制度的虛應故事；學校裡的權利義務失衡，普遍採行威權式的管理；教育未能獨立於政治之外，受到政治力量廣泛而嚴密的控制。

然而，各級教育行政機關最關心的是，學校運作的不正常：不按課表上課，違規能力分班，參考書測驗卷取代了教科書，各種大小考試佔據了大部分的教學活動時間，補習盛行，不論正規上課時間或課後補習，教室裡流行的是打罵教育，許多學生越區就學等等。教育行政單位認為這些大體皆和升學競爭有關，假如這個看法是對的，我們便可以把這些不正常的現象稱之為「升學症候羣」。

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是：「升學症候羣」的病因何在？根

據教育行政單位慣常的說法，升學症候羣的起因在於學校的社會環境不正常。由於整個社會普遍只重視升學，不重視教育，社會奉行的是升學至上的升學主義，是這種社會風氣帶給學校壓力，從而扭曲了學校教育。教育行政單位似乎忘了，近數十年來，每當社會出了問題，有了風氣上、秩序上、道德上的缺憾，論者最終總不免歸罪於學校，而教育行政單位主管也總是從善如流地表示要痛加檢討。是則，究竟是社會敗壞了學校，或者是學校敗壞了社會，實在大有爭辯的餘地。

更有趣的是，從自學方案的相關文獻中可以看出，教育行政單位認為，升學主義之所以風行，是因為我們有了運作數十年的「聯考制度」。升學主義是一種「主義」，這半世紀來在本地唸過高中的人最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是：「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然而聯考畢竟只是把數萬人集合起來進行的一場紙筆測驗，究竟從何而能產生思想、信仰和力量，而這個力量又大到足以扭曲資源龐大、制度森然的學校教育，恐不免出乎常人的理解能力之外。

體質與環境

教育改革是建立在教育診斷的基礎上的。教育診斷不但決定我們用什麼眼光去看教育問題，也決定我們能提出怎樣的改革措施——假如我們不用「方案」這麼引人遐思的字眼。只有像自學方案那樣把一切的教育罪惡歸諸於「聯考制度」，才會認為改革「升學分發辦法」是改革教育的不二法

門，才會訂個讓學生遵守的辦法，去改正校長和教師所犯的錯誤。

不幸的是，今天的教育現實是如此百孔千瘡，好比一個百病俱發的病人，其病因自然不止一端。更複雜的是，同時發作的各種疾病卻不是彼此獨立的，它們通常互相牽引，彼此增強。舉個例子來說，開始的時候，學校可能只爲了提高升學率而違規能力分班，其後果卻不只是把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生分到不同的班，而且被分到後段班級的學生開始受到有系統的歧視，因爲他們拖累了整個學校的升學率，學校不免要把他們視同「麻煩」來對待。這種歧視使許多學生心生不平，更多的人自暴自棄，於是學校裡頭有了不安的因子，造成更多的問題，這些後段班的學生也就更成爲學校的「麻煩」。十分明顯的，「追求升學率」不是這一切的唯一病因。如果不是校長的操守和教育理念出了問題，如果不是有一部分教師附和校長，或者屈服於校長的壓力，違規能力分班根本不可能，其後遺症也不會這麼嚴重。

違規能力分班是集體的違規行爲，這個現象反映的也許是教育人員品德與觀念上的缺憾，也許還反映出學校權力體系的不正常特質。它本身又衍生出其他的問題。由於行爲本身是違規的，於是總其事的校長、安排編班事宜的行政人員，受命教前段班的教師便成了「命運共同體」，利害一致，也都和供應參考書、測驗卷的商人有了利益上的關係，產生了進一層的操守問題。學校裡頭自然會有一些未參與這種集體違規活動的教師，他們被安排教後段班，有時甚至和他們的學生一起受歧視，於是產生了嚴重的疏離感，教學上意興闌珊，讓學生更明顯地感受到歧視。

對於這麼複雜的教育病理，草率的診斷自不免失之毫釐，謬以千里。過去這些年來，對於種種教育問題的存在，可以說是有藉口而無爭議的。然而，對於這些問題的診斷，則是皆有說辭且大有爭議的。聯考確實使孩子們焚膏繼晷、茶飯無心，大部分家長也確實為子女的升學，不惜付出沉重的代價。另一方面，許多教師根本不適任，許多校長操守不良，甚至於被起訴、判刑，這些也無可置疑。然而，在衆口紛云、議論橫生之後，社會最普遍接受的說法是：無形無相的升學主義，與衆人皆曰可殺的聯考制度，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不幸，這樣的診斷從無細緻的病理分析與檢驗的資料基礎，宜其雖有說詞而不免滋爭議。

其實一個人生病原因只有兩類，一個是外感的，一個是內發的；一個可以歸諸體質，一個則出乎環境。教育的病症亦然。這樣看來，把教育問題歸諸於「升學主義」，說社會風氣扭曲了教育，是個典型的「環境論」，把它歸諸於學校的制度、教師的品質，則可以稱之為「體質論」。然則把教育問題歸因於聯考，則是個十分曖昧的說法。聯考是由教育體系自身所設計且執行的，社會對之十分痛惡，教育行政單位卻又似乎無能以行政命令取消它。這樣看來，它既非環境的，也不是體質的，倒像是唐吉訶德的風車，乍看像惡魔，其實只是身不由己的龐然大物。

打個比方來說，今天大家痛恨聯考，就好比一個病人住院住了久了，不免痛恨起他每天穿的病房制服。康復的病人出院後誠然可以不再穿那一身病服，單純的脫掉病服卻無助於康復。聯考確實有許多問題，正如大多數的病服都不免全無美感。然而，我們今天之不得不有一個聯考制度，也許正如

病人之不得不穿病服，另有它不得已而爲之的理由。

教育的體質與改革的體質

這樣看來，我們今天與其「想當然耳」地將教育問題歸諸於升學主義或聯考制度，還不如更細緻的作教育診斷，把各種教育病症的起因、擴散和轉移的種種真相弄清楚。過去這些年來，大家好談升學主義，自然是環境論者。然而教育的問題也許主要的出乎不良的體質。譬如說，整個教育系統的運作目標也許根本不對。三百年前黃宗羲所痛陳的那些，也許正是今日問題的關鍵所在。

教育的體質自然不僅和教育目標有關，更和制度有關。今天的教育行政如果「一切委之俗吏」，今天的師資養成制度如果引進一堆名利競逐之徒，使得「所謂學校者，科舉蠶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黃宗羲，前引文），則「學校之法廢，民蚩蚩而失教」的後果自在意料之中。三百年前，黃宗羲就注意到師資在教育中的關鍵地位，而有了十分激進的主張：「其人稍有干於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爲吾師也。」（前引文）這樣的主張時至今日猶不可企及。

國家出於政治、社會的意圖，嚴密地控制教育，把學校辦成職業訓練所（養士），用科舉來敗壞學校，於是學校失去教育的功能，起而代之的是私人興學的勃興（書院的興起），於是國家進一步控制私立學校，扼住其生機，教育因之完全敗壞。這一套說法是黃宗羲對明末教育的診斷（見前

引書），看來卻好像和今日的狀況若合符節。

看來歷史真是一面鏡子，可以使人瞭然於興衰之所寄。今天追溯歷史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讓我們明白流動於今日教育血脈中的還有那些得自傳統的遺傳基因，這些基因多少決定了我們今天的教育體質。以學校裡流行的體罰為例，打罵盛行誠然是不擇手段地逼學生讀書的「升學症候羣」之一，然而，這麼依賴打罵卻反映了某種教育觀，這種教育觀被認為是出乎「不打不成器」的傳統。

國家花了許多資源去培育師資，如果到頭來多數教師們只接受傳統的流俗觀點，作為他們辦教育的指導原則，這誠然是教育體質問題。反過來說，如果打罵之盛行是教師們在家長的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當然只是環境問題。以今天的證據看來，體罰現象似乎不能單純的歸諸於家長的壓力，更難說是由於家長的「升學主義」。

研究體罰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看出教育問題的根源所在，讓我們能不把所有頭部疾患都扣在「升學主義」的帽子底下。把體罰視為升學症候羣之一，歸因於家長的壓力，實不如從這個現象入手，探究教師們的教育觀，及其背後的師資培育問題，來得有啟發性。數十年來，我們的教育之所以改進的少，惡化的多，理由之一也許正是，我們太容易相信諸如「升學主義」之類的現成說法，以致於停止了我們對真相的探究，以及任何進一步診斷的努力。

這就談到改革本身來了。數十年來，關於教育改革最明白的事實是：改革從未生效。這個事實指出，不但改革應先之以更深入的教育診斷，即連改革本身也成了診斷治療的病患。如果過去這段漫長的改革經驗不能使教育獲得改善，自

然要問，究竟這些改革出了什麼問題，是什麼樣的運作機制使得真正的改革成為不可能？如果社會不能從教育改革中獲益，至少也應從改革經驗中獲得教訓。

過去這些年來，對於改革之失敗最主要的說辭依然是，「升學主義」之類的社會觀念造成太大的改革阻力。這當然是典型的環境論。不幸，如果環境論是對的，等於宣告，在世道人心改變之前改革簡直沒有希望。觀諸民間教育改革團體如雨後春筍般以次林立，這種改革無望論恐怕是民間的改革者所不能同意的。

大部分實際從事改革工作的人都比較容易感受到環境上的阻力，也比較傾向於把失敗的原因歸諸於環境。反過來說，大部分批評者都容易看到被批評者的弱點，也就傾向於把失敗的原因歸諸於改革機構本身的體質。換句話說，從事改革的機構較可能是環境論者，批評改革的人較可能是體質論者，官方的改革機構傾向於環境論，民間的異議團體傾向於本質論，這是人性使然。不幸，近半個世紀來，在臺灣，只有官方機構有權力、有資源去進行教育改革，民間的改革團體一直只能扮演批判的角色。這個局面使得環境論長期佔有優勢，本質論絕少被列入考慮。

然而，以自學方案為例，這個號稱「四十年來最重要的教育改革方案」一經提出，便受到廣泛的質疑，被迫一再修正，這個現象豈不是正好指出，那個擬訂方案的官方機構在體質上有了重大的缺陷？他們的觀念、眼光、思考方式，以及運作方式豈非大有可疑之處？事實上，這些年來教育與教育改革皆出乎同一隻手；懷疑教育的失敗與改革的失敗出乎同一個體質問題，恐怕是個合理的懷疑。

總結來說，對我們的教育體質進行診斷，此其時矣。從教育體系的運作目標、指導原則、體制的特徵，到師資培育制度、教師的教育觀，乃至於教育行政人員的教育觀、改革觀，都值得好好加以檢視，這正是本書的目的。

關於本書

這是一本教育診斷的書，讀者不難猜到，我們想對當前的教育體質進行診斷，並澄清環境論的迷霧。就如同我們在本文一開始即引黃宗羲的話，強調教育目標的重要，我們相信它是體質背後的基因，是教育成敗的最根本因素。或者，更貼切地說，只有當教育指向一個合理的目標時，社會才可能覺得教育是成功的。正如同一家營利事業只有賺錢才會被普遍地認定為經營成功，因為賺錢公認是營利事業合理的目標。我們在第一篇〈教育的正義〉中對當前臺灣教育體系的運作目標及其運作機制作診斷。我們相信教育的合理目標應指向正義的體現和人權的發揚。自然這個目標的達成也應滿足一定的程序正義。我們的診斷顯示，許多教育上的病態，包括通常怪罪到升學主義頭上的問題，其實都可以在不符正義的教育目標及其衍生的體制中找到根源。

第二篇〈升學主義、升學制度與升學症候羣〉，追究升學主義的真相，探索它的起因和影響，釐清升學制度的角色，還它一個本來面目，然後對今日的升學症候羣作一個診斷。這個診斷的結果是十分本質論的。因此也是不同於過去流行的環境論之全新觀點。我們的研究顯示，不合理的高中職